

「國族典範」與「大同」理想

● 蔣英豪



魏源對西方文明的企羨並不局限於船堅砲利的科技，而及於政治制度，他更因在危機中接觸到西方文明而煥發了在晚清引起許多思想家共鳴的「大同」思想，這在《海國圖志》和《魏源集》中都有所反映。中國近世知識份子救亡運動的基調，可說是魏源定下來的。

鮑紹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還，外侮日多，救亡自存已成此後一百年間知識份子思考的重要課題及改革家活動的主要目標。響徹雲衢的救國呼聲，其主調無疑是從魏源時代就定下來的「師夷長技」。魏源所能接觸的外國資料雖然不多，但他對西方文明的企羨並不局限於船堅砲利的科技，而及於政治制度（如美國的民主制度），他更因在危機中接觸到西

方文明而煥發了在晚清引起許多思想家共鳴的「大同」思想，這在《海國圖志》和《魏源集》中都有所反映。中國近世知識份子救亡運動的基調，可說是魏源定下來的。當然由於時代與環境的限制，他不可能有周詳的計劃與具體的行動，這是後起改革家的職責。當全面的社會改革（而非個別項目的科技學習）提到議事桌上的時候，改革家便開始忙於在西方列強中找尋全面模仿學習的對象，其中也包括了因學習西方而致富強的日本。在找對象的過程中，改革家們着眼的不外是中國的國情、對象的成就、模仿的可行性等幾方面，而為了加強他們所選擇的對象的說服力，他們也毫不猶豫的把對象「理想化」、「浪漫化」，讓沉淪於受欺凌之苦海的中國國民有無限的憧憬。

鮑紹霖此書以十九世紀末年至二十世紀30年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以自救的過程中的幾個階段為研究範圍，指出從戊戌維新到抗日聖戰前夕的四十年間，政治領袖賴以實現他們追求富強的政治理想的手段是以西方為師，樹立民族與國家的典範（學習對象），而在這四十年間提出來的較有政治影響力的典範，則有彼得大帝時代的帝俄、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大革命時期的

法國以及兩次大戰間的德國。書中第二章到第五章即先後介紹這四個典範在中國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作者再三申明「國族典範」、「民族形象」研究在了解近現代歷史以至當前國際環境上的重要性，並指出在中國近現代史學術研究中這方面研究的嚴重不足，頗有見地。本書的第一章即着手於這方面文獻的整理與理論的探索，交代了誘發本書寫作的兩本著作，白禮士 (Don C. Price) 的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及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的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表揚其「鑿空」之功，又指出其不足之處，作為本書展開討論的起步點。事實上，本書確能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此書主題明確，作者在〈自序〉開頭第一句就說：「本書以中西文化交流中民族形象的影響為主題。」作者亦能驅遣眾例以支持己說，剪裁資料，針線亦密。作者在第一章理論架構的基礎上，分別用了四章的篇幅討論俄國、英國、法國、德國這四大「典範」。第二章以白禮士的研究為基礎，指出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心目中的「國族典範」是彼得大帝時的帝俄而非明治天皇的日本。第三及第四章以鮑氏1979年撰成的題為“Visions of Civilization: National Images of England and France among Chinese Journalists, 1895-1919”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分別討論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留日人士塑造的「富國強兵」的英國典範及「文明開化」的法國典範，也討論了國民性改造的問題，並比較中日兩國在這兩個典範之間的選擇。作者並分析了

法國典範對辛亥革命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第五章以柯偉林的研究為基礎，討論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火鳥重生」的形象對當時中國政治的影響，並附及俄國大革命後集體模式的影響。第六章〈結論及觀察〉，總結「民族形象」問題在中國政治上帶來的影響，融合了理論、歷史與現實，為全書作一收束。

整體而言，本書作者寫作態度嚴謹，其研究亦周詳縝密，其所成就的是一本織工細緻，剪裁勻稱，令人賞心悅目的學術專著。筆者讀後想提出兩個相關的看法，希能就正於方家。第一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在中國追尋「國族典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作者雖然舉俄、英、法、德為四大「典範」，但他並沒有忽略日本。不過作者認為日本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只是「稜鏡」的作用，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認識，許多是透過它得到的。康有為同時向光緒帝進呈過《日本變政考》與《俄彼得變政記》，作者認為康有為所重者乃彼得大帝時代的帝俄而非明治天皇的日本，理由之一是根據康氏的措詞，日本在維新後「雄視東方」，但俄國變政後卻「遂霸大地」，「『東方』只是一個區域，顯然是比不上『大地』——即全世界——了」(頁35)。「大地」一詞在晚清文獻中誠有用於指「全世界」的，但多指廣闊的地面，就十八、十九兩世紀的帝俄而言，謂其「稱霸全世界」，顯然與事實頗有距離，然則康氏所謂「東方」與「大地」都同就影響範圍之大而言，而不必有輕重之分。

日本其實是中國近世追求改良的重要「典範」之一。周策縱教授為

鮑紹霖以十九世紀末年至二十世紀30年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以自救的過程為研究範圍，指出從戊戌維新到抗日聖戰前夕的四十年間，對中國政治領袖較有政治影響力的西方典範，有彼得大帝時代的帝俄、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以及兩次大戰間的德國。書中先後介紹這四個典範在中國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大同」與「國族」表面上看來是對立的，但其實它們是晚清「救亡」主旋律的兩個變調。如果說「國族典範」的追尋代表了文明的憧憬，則「大同」理想是更遠大、更遙不可及的憧憬。奇怪而美麗的是，「大同」理想正是萌生和發展於民族危機最深重的時代。

此書作序，總結了中國過去百多年憧憬文明而終不可得的慘痛經驗，提出要「認知真實」，以避免受表面形象的誤導（頁xi）。相比於書中所舉的四大「典範」，黃遵憲一派提倡日本典範，其態度可能較接近周氏所說的「認知真實」。黃遵憲提倡日本典範，並非朝夕之間一時躁進之舉，而是積二十年之親身體驗，遍歷日本、美國、英國諸國，勤搜資料，仔細比較所得。他還用了十年時間寫了數十萬言的《日本國志》，總結日本維新經驗，以支持一己之政見。他在日本時，正歷維新時期，他對明治維新的觀感，曾經歷激烈的思想鬥爭，而他終於在事實面前屈服。他在確立日本這個典範之前，也曾身歷其境，把日本、英國、美國作最直接的比較，而基於外交事業的需要，他對法國和俄國也有深刻的認識。他不諳外語，是他了解外國的障礙（魏源接觸西方文化時，早已痛陳這方面的遺憾），但從他的言論來看，他在當時可說是較熟悉世界的一人了。他不單要先進的科技和政體的改良，他在作品中歌頌日本維新志士，也可見他沒有忽視國民性的改造。總結而言，在「國族典範」的追尋上，他的作為比他許多同輩和後輩都要踏實。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委他為出使日本國大臣，而在政變前夕三詔催他進京，有人且相信光緒帝想以他入主軍機。凡此種種，都有助於說明，光緒帝當時是重視黃遵憲和傾向於日本模式的。有關黃遵憲及其日本模式，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的*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有很生動的描述；周策縱教授在1985年11月的《傳記文學》上發表〈黃遵憲逝世八十周年紀念題詞〉也指出黃氏對日本認知的「敏感與遠見」。讀者在讀鮑氏書的同時，如能以之與黃遵憲的日本模式作比較，也許對晚清時期「國族典範」的追尋這一問題會有更廣闊的了解。

其次，我想提出晚清改革家「大同」思想的問題。「大同」與「國族」表面上看來是對立的，但其實它們是晚清「救亡」主旋律的兩個變調。「國族典範」與民族救亡之間的密切關係，鮑氏在書中有很詳細的交代。如果說「國族典範」的追尋代表了文明的憧憬，則「大同」理想是更遠大、更遙不可及的憧憬。奇怪而美麗的是，「大同」理想正是萌生和發展於民族危機最深重的時代。而其目的，是借師法西方、融進世界社會而得以自保，進而共進於大同。它以「師夷」為手段以求自保，這點與「國族典範」的追尋是相同的；但它並不停留在自保自強，它還追求「一體化」的理想。晚清時期的改革家、思想家，如魏源、黃遵憲、康有為、王韜、譚嗣同、孫文等都具備這種「大同」的理念。我們在觀賞鮑氏重構晚清追尋「國族典範」過程的同時，也以目的與之相同、理想超出其上的「大同」思想作對照，可能會有更廣闊的視野。作者在書中提及自二十世紀20年代開始，對西方的尋索「從個人主義轉到群體主義」，其中的蘇聯模式，更對現代中國歷史發揮巨大影響。讀者如果了解中國近代「大同」思想的源流，對作者這項陳述可能會有更深入的體會。